清代官修总集在江户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 何 振

[摘 要] 清代官修总集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传播与接受颇能反映中日典籍交流之间隐性的一面。这些总集内容上“诸体咸备,庶汇毕陈”,打破藩园派囿于唐、明诗选的窠臼,在江户中后期汉诗文献编纂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并推动诗坛诗风和诗学观念的转变。但由于自我标榜、著述体例、商业营销等原因,编纂者较少提及其中的文献来源,造成了信息来源的遮蔽。同时,江户社会对官修文献的重新编纂也伴随着原本话语权力的消解和中国文本的“在地化”转换。因此,通过溯源、校对的形式还原江户时期中日典籍交流的具体面貌,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现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关键词] 清代官修总集 日本江户 汉籍编纂 遮蔽

引 言

清代帝王“稽古右文”,崇尚文治,敕修大量总集、类书,仅《清代内府刻书图录》中便著录有37种[1]。正如严迪昌先生所说:“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制控的。”[2]尽管清代书籍出版过程中存在“官私互动”现象,但相较于私人纂修的典籍,清代官修总集[3]仍有特征:内容上,往往汇通各代,规模更加宏大,“诸体咸备,庶汇毕陈”[4],为其他书籍编纂或文人创作提供丰富素材,“风行全国,不仅文人词客,引为獭祭之资,即普通学者,亦藉以征求典实”[5],颇具实用价值;价值导向上,相较于一些审美趣味鲜明的私人总集,官修总集虽不免包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整体仍以调和众味、折衷唐宋为主,易于被不同审美倾向的读者所接受;话语权力上,官修总集在政权的推动下,有着不容质疑的权威地位,诸如“启牖万世”“通万方之略而靡所不究”[6]等,无不彰显官方意志对书籍编纂、士人规训、知识垄断等的渗透和掌控。

由于清统治者允许民间翻刻、售卖,这些官修典籍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流布[7]。加之江户日本的社会需求及商业出版的兴盛等原因,大量的官修典籍亦随商船舶入日本,促进了江户中后期诗歌选本、诗语文献等汉籍的大量编纂,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诗风的转变。然而,在过往的研究中,焦点多集中于王渔洋、沈德潜、袁枚等个别清人诗论在日本江户诗坛的传播和接受度,却忽略了官修总集对日本江户诗坛的影响[8]。因此,本文拟通过考察清代官修总集在日本江户的传播,探索其在江户汉籍编纂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与江户诗风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其在跨文化研究的范式意义,展现清代中日两国典籍之间交流的具体面貌。

1 江户时期清日关系与清代官修典籍东传

清代官修总集在日本江户的传播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尤其在清、日早期交流过程中,政治因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张伯伟指出:“东亚的书籍交流,从国家、社会到个人,其最为重要的部分(未必总是数量最多的部分),……而是由政治决

定的。”[9]作为与明朝有长期交流历史以及深受儒家“华夷之辨”思想影响的日本，明亡之后一直对清政府有所抵触，这种抵触情绪自然也影响了江户前中期诗坛对中国典籍的选择，造成了清代官修总集早期传播过程中的“冷遇”。

延宝二年（公元1674年）林罗山之子林恕在《华夷变态》一书的序言中犹称清朝为鞑虏：

> 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10]

日本社会对清朝的态度间接影响了日本诗坛对诗歌风格的选择，其中蘐园派代表人物荻生徂徕（1666-1728）最为显著。荻生徂徕是江户中期诗坛明代复古派理论的有力倡导者，在他的影响下，“海内诗风一变，为唐为明”[11]。有关荻生徂徕对明复古派的接受过程，学界已多有讨论，但对其背后的心理因素似未能注意，其《题唐后诗总论后》云：

> 其最惑人者，长崎人诗，日与华客相酬和，则以为师承渊源，莫真于是也。……文章之道与气运盛衰。方今明亡而胡兴，推之前古草昧间，文气尚阂，其踵习晚明，亦犹洪永袭元余也。[12]

江户时期，长崎是清、日之间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窗口，当地诗风颇受当时来日清人的影响。田能村竹田（1776-1834）记载：“长崎镇，华夷通交转货处，故士民富饶，家给人足，治平日久，渐响文教。加之清商内崇尚风雅……故余习之所浸染，诗书画并有别致。”[13]长崎诗人追随清人风尚的习气颇让荻生徂徕不满。在徂徕心中，他不承认清政府的正统地位，认为其世是“胡兴”的衰世，而清初诗坛流行的公安、竟陵诗风都是明末兴起的诗歌流派，因此他认为日人跟随清人学习晚明公安、竟陵诸人学说，就像明初学习元末的诗风一样，都属于“亡国之音”。这种“明亡而胡兴”的心态在徂徕其他论著中也有反映，其《复于士新》说：

> 不佞抗颜为师者十年邪，海内有志之士比比奋起，乃中土之寥如，心深怪之。盖以九鼎不迁，筍簴谧然。凡百文物制度，宛若千岁之旧，而独其如斯者，岂神州清淑之气澌邪？王室不复兴邪？每为之潸然者久矣。（荻生徂徕：2019：311-312）

这种观念并非徂徕一人所有，而是当时日本社会普遍的心理认同。因此，受“华夷之辨”思想以及当时蘐园派受明复古派“大历以后弗论”[14]的影响，清朝建立最初的一百余年，日本诗坛对清人多持否定态度，更遑论积极援引清人的诗学成果。

不过日本社会对清朝抵触的情形至乾隆年间（1736-1796）已有所转变。乾隆以前，中日两国遇到海上难民事件，多由地方官员委托商人遣返难民，避免两国政府正式接触。而乾隆十六年（1751年）遣返日本漂流难民时，清政府以咨文的形式告知“日本国王”，日本也以“长崎奉行”的名义进行答复[15]。日本对清朝态度的转变，也促进了日本诗坛开始向清人学习。如梁田蜕岩（1672-1757）在刊于宝历五年（1755年）的《清诗选选》序言中即质疑徂徕为何对清人典籍一概不取：

> 曩予观康熙中板行书，清朝人文之隆，不让前明。……《唐后诗》左袒王李，以讥清儒，亦未尝一言及《清诗选》，何也？……《清诗选》乃当是时海舶未至邪？不然，蘐老该博有卓见，胡以遗弃为？欿然不得不为斯人憾也。[16]

梁田蜕岩推测荻生徂徕“未尝一言及《清诗选》”的原因在于当时“海舶未至”，未流传至日本。此说有一定道理，孙鋐《清诗选》虽刊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但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宝历四年（1754年）方传入日本[17]，徂徕生前可能未及见到。然而考虑到徂徕对清人的态度加之受明复古派诗学思想的影响，即使他在世时接触过《清诗选》，也未必会提及此书。如《御定全唐诗录》《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书于宝永（1704-1710）至享保（1716-1735）年间便已传入日本，当时徂徕仍然在世，但并未见他及其他蘐园派诸人提及。

江户后期，中日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清人典籍大量传入日本，朝川鼎（1791-1849）在天保八年

（1837年）刊本的《清嘉录》序文中即说：“近刻清人诗集，舶到极多，以余所见，尚有二百余部。”[18]与此同时，江户后期诗坛也积极援引清人诗学成果，山本北山的弟子广濑淡窗更是称“清诗为唐诗之阶梯，……清诗用典、属对、议论巧妙，读之使人易生趣向。”[19]尤其是王渔洋、沈德潜、袁枚三人的诗风诗论直接影响到江户后期诗坛的诗风、诗论。

这种社会心理的转变影响到日本江户诗坛对清代官方典籍的接受，从当时相关舶来书籍的数量即可看出。尽管由于年代久远，现存唐船持渡书资料的部分数据可能缺失，但仍能大体反映日本社会对相关书籍的需求。以《佩文韵府》为例，《佩文韵府》成书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至少于享保七年（1722年）便传入日本，传入速度并非很慢。享保七年至弘化二年（1845年）之间共传入16批次，计129部，但其传入数量并非呈现规律性地递增状态，而是在1759年、1794年、1845年几个时间点突然激增，最多一次传入51部（大庭脩，1967：453-739）。

《佩文韵府》这种传入的情况并非特例，考之其他官修总集亦是如此。如《佩文斋咏物诗选》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元文五年（1740年）传入日本，至安政七年（1860年），共传入15批次，计217部，于1759年、1799年、1829、1855年4个时间点大规模输入，最多时达102部，基本与《佩文韵府》的时间点相吻合（大庭脩，1967：453-739）。其他如《唐宋诗醇》《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等官修总集的输入亦呈现以上特点。事实上，这种激增并非无规律可循，实与当时社会心态、市场需求和诗坛风尚的转变息息相关。

综观清代官修总集在日本江户诗坛的传播，基本是一个由“冷”到“热”的过程。尽管一些典籍在刊刻不久即传入日本，但多是出于官方采购的需要[20]，当时社会仍普遍对清人抱有偏见，故数量较少，也未对诗坛产生太多影响。至江户中期（1750年）以后，清代官修总集大量输入日本[21]，并对日本诗坛产生重要影响：一是清代官修总集的输入促进了日本诗坛大量诗选、类书等汉籍文献的编纂；二是清代官修总集的输入拓宽了江户诗人的阅读范围，进而促进诗坛诗风的转型和诗学观念的转变。

2 清代官修总集对江户汉籍编纂的影响

清代官修总集传入日本后，促进江户中后期诗歌选本、诗语文献等汉籍的大量编纂。然而，书籍之间的交流有时并不是直接产生联系的，正如罗伯特•达恩顿指出，印刷出版的书一般都会经历“从作者到出版人（如果卖书的人没有介入这个环节的话），再到印刷的人，再到运输的人，再到卖书的人，最后到读者”的“传播线路系统”[22]。这意味着书籍在传播过程中，很可能受到某些环节的影响而改变原貌，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但这种呈现经常是隐性的，其中的联系有时需要通过溯源的方式才能显现出来。

附于一些新书末页的广告语颇能反映当时社会对清代官修总集的认知。如馆机（1762-1844）刊于文化五年（1808年）的《晚唐十二家绝句》书末附有《万笈堂新镌发行诗集类略目》，“略目”即书坊万笈堂新刊书目的广告，其中便有对《佩文斋咏物诗选》《佩文斋题画诗类》等官修总集的介绍，如《佩文斋咏物诗选》：

> 康熙御选历代咏物之诗一万四千余首中，钞出初学者鲜学之六朝、唐、宋、金、元、明之古诗、近体，实花朝月夕、席上雅集、游览旅行之重宝。[23]

又如《佩文斋题画诗类》：

> 康熙御选历代题画之诗，凡山水、人物、故事、花卉、翎毛、虫鱼、走兽等画赞之诗，非独诗家之必用，亦书家、画家必得重宝之书。
>
> （英平吉，1808：書末2b）

“重宝”云云，属于书坊的溢美之词，但供初学者“席上雅集、游览旅行”时参考、创作却非虚言。可见，这些清代官修总集主要供江户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时以资取材。

不过，清代官修总集在日本江户的传播过程中亦存在两个困境：一是这些典籍往往卷帙浩繁，

如《佩文韵府》444卷、拾遗112卷、《佩文斋咏物诗选》486卷、《渊鉴类函》450卷等，雅集、游览时不易携带；二是内容庞杂，门类繁多，许多内容并不符合编撰者的诗学观念和日本社会的审美风尚。因此，日本诗坛对官修总集的内容往往加以择录，重新编选符合其要求的诗选或类书，这也造成汉籍编纂过程中文献来源的某种遮蔽。

日本诗坛对官修总集的择录方式有二：

一是直接据某一部书加以编选。江户后期诗人馆机编选有《晚唐十家绝句》（1807）、《晚唐十二家绝句》（1808）、《晚唐二十家绝句》（1809）、《中唐十家绝句》（1810）、《中唐二十家绝句》（1824）、《晚唐百家绝句》（1844），其中人物小传和诗歌基本全据《全唐诗》钞出。此外，馆机还编选有《佩文斋咏物诗选初编》（1812）、《佩文斋咏物诗选二编》（1830），亦是从原本《佩文斋咏物诗选》抄录，“作一小帙以备携带之资”[24]。原本《佩文斋咏物诗选》依照天、日、月、星等，共分为486类，附见者49类，和刻本《佩文斋咏物诗选初编》保留了康熙御制原序，按照原本的顺序选录卷1至卷242的内容，共计151类，其中山石、水系、乐器等类目较多的部分删减较多，仅保留名山大川或常见的事物，诸如瑞气、立冬、佛日盘山、茅山、小孤山、曲江、淮水等，与日本风物关系不大或内容相近的类目则尽数删去。从选录的内容来看，除了四言古体这类日本人极少创作的体裁外，五言、七言的古、近体都有保留，作者范围上自帝王、下至僧侣，朝代则涵盖魏晋六朝至元明。同样，二编按顺序选录原本卷243-486的内容，共计171类，去掉糕、饼、榕、梧桐、骆虞、象、骆驼等与日本饮食不密切或日本少见的风物，诗歌的体裁、类型、作者群体、朝代分布基本与原本保持一致。

《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在江户的编刻亦与之相似。一种是西岛兰溪的《历代题画诗类绝句抄》（1813）、《历代题画诗类绝句抄》续刻（1817）分别从陈邦彦《御定历代题画诗类》择出绝句844首和662首。在编选过程中，西岛兰溪保留了原本的全部类目，朝代亦涵盖唐宋金元明，体裁方面则仅选取江户后期最为流行的绝句。另一种则是天保九年（1838年）卷菱湖校订的《康熙御定题画诗类》，此书亦保留原本的全部类目，作者群体、朝代分布、体裁基本与原本相一致，只不过同题之作仅保留一首。如《观庆云图》有李行敏、柳宗元、阙名三首，和刻本仅保留柳宗元一首。

可见，直接据某部书加以编选的方式最为快捷，一方面保留康熙原序，彰显文本来源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基本保留原书的主要门类，内容上又符合日人的审美倾向与日常需求，加之内容精简，便于携带，适应当时商业需求。

二是据数部典籍编选，来源较为复杂。如冈崎卢门（1734-1787）编选于安永五年（1776年）的《唐咏物诗选》，鉴于《佩文斋咏物诗选》“历代混淆，体裁驳错，不便搜考”“又其部类，多所阙轶”[25]，因此冈崎卢门“撷采之于《文粹》《英华》《纪事》《唐诗纪》《唐诗所》，暨张玄超之《唐诗类苑》、俞羡长《诗隽类函》、康熙之《全唐诗》《渊鉴类函》等之诸书，以裨益之”（岡崎廬門：1776：1b-2a），重新加以编纂。如果单从序言来看，冈崎卢门罗列书目众多，很难判断清代官修典籍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但据笔者统计，卷一天文类录诗47首，其中源于《佩文斋咏物诗选》的有38首，占了八成，其余《全唐诗》6首，《唐诗纪事》2首，《渊鉴类函》1首。时令部录诗69首，其中《佩文斋咏物诗选》38首，占了近七成，其余《全唐诗》17首，《唐诗纪事》5首，《渊鉴类函》2首。同样，冈崎庐门编选于安永七年（1778年）的《题画诗选》，从其选诗来源看，也基本不出《佩文斋题画诗》《佩文斋咏物诗选》《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三种。诸如马臻《题秋山图》、萨都剌《夜宿金山题金山图》、陶宗仪《题雪景山水》、刘基《题画山水》诸作，既无别集流传，亦很少被其他选本收录，集中见于《佩文斋题画诗》。再如刊于文政七年（1824年）津坂东阳的《绝句类选》、刊于安永九年（1780年）香山适园的《六代咏物诗纂》等均有此现象。

除诗歌选本外，日本江户诗坛还编选有上百种诗语文献，即收录大量诗歌辞藻，以供初学者作诗参考之用的类书。然诗语文献的内容琐屑饾饤，编选者较少提及其中的文献来源，因此学界很

少注意清代官修文献在其中的作用。实际上，江户中后期诗坛诸人为了矫正藏园派陈腐剿袭的弊端，从诗歌的辞藻、内容入手，拓宽诗语的取材范围，倡导“清新”诗风，并编纂大量的诗语文献以供初学者参考[26]。不过，与视清人为“鞑虏”“胡兴”的荻生徂徠不同，此时诗坛已有意识地借鉴清人成果，在编选诗语文献时大量参考清代官修总集。

刊于享和三年（1803年）大窪天民（1767-1837）的《增订宋诗础》，“辑宋诸家押韵，编一小册”，以帮助初学者“脱出伪窟”[27]。不过其所谓“宋诸家押韵”者，基本以《佩文韵府》《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等书所收宋人诗句为主。以“东”字韵为例，共收录辞藻38个，其中取自《佩文韵府》26个，《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6个，《宋诗纪事》3个，其他则可能来自陆游、范成大等少数流行的宋人别集。诸如“夕阳东”“佩丁东”“水向冬”“似初冬”“放鱼池”“面枕池”等诗语，出自宋祁、梅尧臣、苏颂等人诗句，这些诗人中有些并无别集流传至日本，却集中见于《佩文韵府》。

又如东条耕（1798-1878）的《新编幼学诗韵》，书中收录卢纶、李端、羊士谔、赵朴等人诗作，以及“绕郭青”“万叠青”“画难形”“半池萍”等诗语，这些诗作或诗语同样在其他选本多不见收录，而集中见于《佩文韵府》《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佩文斋咏物诗选》诸书。其他如东条琴台《新唐宋连珠诗格》、伊藤新《续诗韵碎金幼学便览》、林龚士谦《幼学诗韵续》、冲惟穆《律诗韵函》等亦是如此。

可见，江户后期诗选、诗语文献的大量编纂均与清代官修总集的输入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由于自我标榜、著述体例、商业营销等原因，有些编纂者较少提及其中的文献来源。如前文提及的冈崎卢门的《题画诗选》，其序云：“尝每读诸家之集有题画之诗则录之”[28]，观其句意，似是强调辑录诗歌出自各家别集，以示其读书广博。但事实上，其中很多诗人的诗作并无别集传入日本，只能从清人整理的总集中选录。由此观之，冈崎卢门在序言中不免有自我标榜的嫌疑。类似情况的还有馆机的《晚唐诗选》，馆机在“发凡”中说“就诸家本集取己之所喜者补入”[29]。但馆机所说“诸家本集”，“绝不只是各家单行的别集，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全唐诗》《唐音戊签》这类总集中被编辑成若干卷的各家集子”[30]。可见，编选者在编纂诗选过程中，有时会故意掩饰文献的真实来源以标榜自己读书广博。

还有一些文献因体例原因，并未标明文献来源。如江户后期流行的诸多诗语文献，其目的在于以诗语引导初学者创作。序言或凡例多侧重论述学习“诗语”的重要性，故仅仅选录清代官修总集中的语料，而未提及其选材范围，只有通过溯源的形式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当然，日人对清代官修典籍的重新编选也意味着对原有知识权力的消解，进而产生文献来源遮蔽的现象。米歇尔•福柯认为知识的生产与权力的运作密不可分，知识不仅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工具。清代帝王纂修典籍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彰显文治之胜，另一方面借助编纂书籍剔除不符合统治利益的违碍内容，以此规训士子，“由名物度数之中，求合乎温柔敦厚之旨”[31]。不仅如此，官修典籍往往冠有“钦定”“御定”等字样，标志其话语权力的合法性、权威性。然而，日人在编选汉籍的过程中，却有意淡化这种权威性。冈崎卢门在《唐咏物诗选》的序言中，一方面称赞《佩文斋咏物诗选》“咏物之作悉备”，另一方面又指摘其“历代混淆，体裁驳错，不便搜考”（岡崎廬門，1776：1b），通过消解原书的权威性，重塑符合自身审美标准的话语权力。因此，这种挑战知识主体、重构知识权力的方式，消解了原有官方书籍话语权力的垄断性，在此过程中，原有的文献来源也因此可能被遮蔽。

综上所述，尽管日本江户诗坛对清代官修总集或有批评，但从其编纂的诗歌选本和诗语文献的资料来源看，清代官修总集在其中的运用十分普遍。不仅如此，从编校者来看，既有儒者（西岛兰溪）、诗人（葛西因是、冈崎卢门、大窪天民），又有书法家（市河米庵、卷菱湖）等，阶层和身份都颇为广泛；从出版商来看，江户、大阪、京都三个文化中心的主要书肆都有参与。由此，亦可看出清代官修典籍在日本江户的流行和社会需求。

3 清代官修总集对江户诗风转型的影响

清代官修总集内容广博、全备，大量传入日本后，打破了过去蘐园派囿于唐明诗选的窠臼，拓宽了日本江户诗人的阅读视野，顺应了诗坛知识化的需求，从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诗坛诗风的转变和本土化进程，也影响着某些诗学观念的转变。

首先是助推江户诗坛宋诗风的兴起。以往蘐园派汉诗取材较为狭隘，“唯有唐、明诗础之类数部而已”[32]，因此诗歌往往千篇一律，“争事剽窃，神韵乃乖”[33]。而江户中后期清代官修总集的传入，其丰富的内容顺应了诗坛变革的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诗坛诗风的转型。如荻生徂徠的再传弟子原田东岳（1729-1783）在其刊于1772年的《诗学新论》中便谈到清代官修总集对诗坛风尚的影响：

> 近来东渡者其丽不亿，……大氏雷同伊洛，模艳宋文，犹且欲博极宇宙，以胜于明矣。《清会要》《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及《图书集成》等书，为此而出焉。……如《佩文韵府》，徒引宋诗为出处，不注义训，侔于土苴，何益？[34]

原田东岳与徂徠观念相同，都是盛唐诗和明诗的倡导者，他不满于当时清代官修总集的大量输入助长了宋诗风的兴起，对此多有批评。这些官修总集在内容上是否真的“模艳宋文”暂且姑置勿论[35]，但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助推了当时诗坛的诗风转变。其中较典型的当属释慈周（1734-1801）和山本信有（1752-1812）。

释慈周对宋诗的提倡有“先鞭之功”（松下忠语），“倡宋诗者，欲折明人之弊也”[36]，其《葛园诗话》颇能体现他的诗学主张。《葛园诗话》收录662条典故词汇，多以尖新、生僻著称[37]。据松下忠考证，《葛园诗话》所引例证最多的诗人有杨万里（180次以上）、陆游（160次以上）、杜甫（100次以上）[38]。但除此之外，书中还引用陆龟蒙、皮日休、方岳雪、戴昺等人之诗，收录广泛。这些诗人当时并无别集传世，大多采自《全唐诗》《咏物诗选》《佩文韵府》诸书。

同样，宋诗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山本信有在其刊于1804年的《孝经楼诗话》中提到《佩文韵府》：

> “赵氏连城璧”之诗乃杨炯之作，世所知者，然《佩文韵府》“璧”字下引此诗为李白诗。又《佩文韵府》“过”字下“燕过”之处引宋代晏殊诗“小阁重帘有燕过”出，其末“海燕过”之处再引“小阁重帘海燕过”出，此书多有此类，今举其一端。[39]

尽管看似山本信有对《佩文韵府》有所批评，但实际上，《佩文韵府》是其编纂《诗藻行潦》的重要文献来源。而且“赵氏连城璧”和“小阁重帘有燕过”分别见于《佩文韵府》卷一百下和卷二十下，可见其对《佩文韵府》之熟稔。此外，宋诗派中的大窪天民据《佩文韵府》编《两韵便览》，市河宽斋据《全唐诗》而编纂《全唐诗逸》，菊池桐孙亦据《全唐诗》《佩文韵府》诸书考订诗人、典故，并认为“凡读唐诗，莫善于读《全唐诗》。”（菊池桐孙，2019：1834）

此外，即使一些诗人的别集已在江户诗坛流传，但通过对异文的比对可以发现，清代官修典籍仍是江户文人编纂诗话时重要的阅读书目。如《葛园诗话》“花楦、梅榱、莆地、瓜榱”条，引唐人韩偓诗题《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榱》，元稹诗“何处生春早，春生梅榱中”，陆游诗“余地不忍莆，插榱引瓠壶”“隙地成瓜榱，馀功及芋区”等，[40]所引之例均见于《佩文斋咏物诗选》。又如《诗格刊误》引梅尧臣《咏橘》诗“洞庭朱橘未弄色，襄水锦橙多已黄”，“多已黄”《宛陵先生文集》作“已变黄”，而《佩文斋咏物诗选》作“多已黄”。同条之下梅尧臣《和孙侔雁荡》，诗题与《佩文斋咏物诗选》相同，而《宛陵先生文集》作“依韵和孙侔雁荡二首”。可见，即使一些诗人的别集已在江户诗坛流行，但官修典籍采用类书形式的编纂方式更便于诗人阅读和考索，择取符合自身审美倾向的诗人诗作。

当然，清代官修总集对江户诗风的推动不如清人王渔洋、袁枚、沈德潜那样直接，更多地是间接性、工具性的，但其对宋人及以后文学作品的大量收录，确实提高了宋诗的地位。正如何诗海指

出，清代官修典籍编纂过程中并没有“出奴入主、宗唐废宋的偏激”，但“《渊鉴类函》大量征引、收录宋诗，不但提高了宋诗的地位，促进了宋诗的接受、传播和经典化，也为清中期熔铸唐宋、兼师唐宋思想的普遍流行打下了坚实基础。”[41]江户诗坛唐宋诗之争的发展亦与之相似，诸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佩文斋咏物诗选》等的传入，都在不同程度上破除蘐园派倡导的明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念的影响，其中收录的大量宋人诗歌拓宽了江户诗人的阅读视野，助推江户诗坛宋诗风的兴起。如此，便不难理解原田东岳为何批评《佩文韵府》诸书“模艳宋文”“徒引宋诗为出处”了。

其次，阅读视野的拓展也影响着诗学观念的转变，推动诗体的解放。江户时期大多数日人不懂汉字读音，创作汉诗时多根据律诗的平仄规律填入相对应的汉语词汇，“口不諧、耳不律，惟目以守圈繢分局”[42]，文意通畅即认为是一首符合要求的汉诗，“吟之则以和训，不以音律。故虽知理之通不通，未知音律谐不谐，才赖白黑圈子而证之而已，所谓依样画胡芦类也”[43]。不过这种“唯和训是凭”做法曾遭到荻生徂徠的激烈反对，徂徠主张以华音读汉诗，他认为只有通晓华音，才能真正理解汉诗中曲折多变的情感。然而华音难通，对于蘐园派后学而言，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依然只能严格遵守汉诗的平仄规律。不过，与前人不同的是，蘐园派认为盛唐之诗平仄多有不协调之处，而明代李攀龙严守格律，独得其正，因此以李攀龙的平仄为标准，对盛唐诗人失律之处多有批评。“近体以声律为主，然考之唐人集中，虽盛唐名家间有失律拗体，况李杜大家乎”“今作《诗则》，凡于唐体全取法于于鳞”[44]。在蘐园派诸人看来，拗体是唐诗中的变调，不足以学。因此在创作汉诗过程中严守平仄规律，几乎不见拗调。

然而，至江户后期，受“无法无不法”的宋诗风影响，日本诗坛有意识地打破过去单一的创作模式，在诗体上寻求变化。因此不少诗人根据《全唐诗》重新总结汉诗的创作规律，并改变对拗体的认知。如中井竹山（1730-1804）《诗律兆》以全唐诗法为例，“夫七律全篇之拗体多于五律，然所谓吴体者，其变百般，以至于阖闢纵横，不可端倪焉。……抑我邦相承，视拗格为诗病，一世翕然，避波浪于安流，畏崎岖于坦途，是则弗察之甚。”[45]认为有些“拗格”唐人常用，而日本诗坛多避之不及，“殊不知如右二体之拗，四唐熟套，自变徂常也。”又如关于三平尾、三仄尾的问题，“诗家于句末忌三平，不必忌三仄。今之法反是。世又有句末三仄拯以三平之弊法，皆大失唐声。”（中井竹山：2019：1291）这些都是通过对全唐诗的重新阅读而产生的新的观念。比中井竹山更进一步的是谷立悳（生卒不详），他在《全唐声律论》中遍检唐诗，并对拗体提出全新的看法。他认为大多所谓的拗体只是一字之拗，是唐人常见的一种体式，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拗体，也不需要后世所谓的拗救。如津坂东阳以为“十”读作“忱”，乃方言，并不违反格律。而谷立悳则认为“十”字属入声，实为拗体，古人不避，乃古人一种常见格式，并不需要从读音上进行避讳。不仅如此，谷立悳还著有《唐宋元明辨体伪集》，故意仿效杜甫、韩愈诸人的诗体，创作“三平三仄诗”“三仄三平诗”“五平五仄诗”等故意违背格律的诗歌，以示唐人之诗皆可为法式。以上是《全唐诗》传入日本后，江户诗人对三平尾、三仄尾、拗体等诗格产生了新的认知。

当然，官修总集中亦存在不少疏漏之处，曾参与编纂《佩文韵府》的查慎行便感叹：“大抵官书每多潦草如此类者，不可胜举也。”[46]尽管江户诗人考证出官修总集中存在的一些讹误，如山本北山指出“赵氏连城璧”之诗乃杨炯之作，《佩文韵府》误作李白诗；津坂东阳指出胡宿乃宋人，而被《全唐诗》误收；东条琴台指出贾至《春思》、陆龟蒙《春夕酒醒》被后世误认宋人所作，意识到自己所编之书“多采总集，则或袭其误，亦不可知”[47]等，但仍有不少舛误未及纠正而进入江户诗人的视野。如释教存《续联珠诗格》“用中字格”条收戴叔伦《兰溪棹歌》（凉月如眉挂柳湾）一诗[48]，实明人汪广洋之作[49]，因《全唐诗》误收而被《续联珠诗格》当作唐人诗例。同样，还有张以宁的《江干》亦被《全唐诗》误收在戴叔伦名下[50]，被日尾省斋作为唐人“真”“殷”韵部相通的例证。其他如宋末戴表元

《寄同上人》被《全唐诗》误作唐彦谦诗，明人史谨《九日》误作殷尧藩诗，这些舛误随着《全唐诗》的流入被江户诗人运用到诗话中。

4 结　语

清代文学、文化对日本江户中后期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本文限于篇幅，仅从整体上探讨清代官修总集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传播与接受，但并不因此否定私人撰述对日本江户的影响。事实上，清代其他一些私人编选的总集也是日人编纂汉籍的重要文献来源。如梁田蜕巖《清诗选选》（1755）据孙鋐《皇清诗选》选录；柏木昶《宋诗清绝》（1813）据曹庭栋《宋百家诗存》抄出其中七言绝句三百首，《续宋诗清绝》（1846）亦是如此；菊池桐孙《清人咏物诗钞》（1852）多据严永龄《本朝咏物诗选》编选等。以上种种，并非一文所能概括。然而，清代官修总集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传播与接受度在跨国文化交流的研究中仍颇具启发性。

首先，跨国文化过程中应注意其背后潜在的书籍交流。江户文人利用官修总集“诸体咸备，庶汇毕陈”的特点，选取符合自身审美价值的内容，与当时诗风诗论相辅相承，促进日本汉诗的转型以及阅读视野的拓展。但由于自我标榜、著述体例、商业营销等原因，在江户时期的别集、总集、诗话中却少有提及，似乎很难看出其对日本诗坛的影响。然而，通过考索江户诗歌选本、诗语文献等汉籍的编纂，以及编纂者、阅读者的身份群体，可以发现清代官修总集的普遍影响力。因此，只有通过溯源、校对的形式，才能展现中日典籍交流之间的真实样貌。

其次，清代官修总集东传的过程还伴随着话语权力的消解。一方面，书籍作为权力和文化整合的工具，冠有“钦定”“御定”的官修总集彰显其知识秩序的权威性、典范性，并影响到东亚汉籍编纂的体例、内容。江户文人利用官修文献进行汉籍编纂以及校对、考据，足以看出其在东亚知识体系中的话语权力。另一方面，从官修书籍到和翻刻、续刻本的传播过程，揭示了汉籍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接受差异。江户文人通过对官修总集的重新编纂，消解了原有的“温柔敦厚”“忠孝之旨”的教化功能，更侧重于知识普及和中国文本的“在地化”转换。这种筛选行为反映了江户社会对汉文化权威的“去中心化”策略，进而确立本土文化的独立性。文化权威与本土话语的博弈在江户汉籍编纂中已初现端倪，至明治以后更加明显。如明治文人森槐南《凤文馆铜刻<佩文韵府>告成……因赋长古一篇》：“满清武英殿，三者足窥帝王崇文之大略……吁嗟乎，汉土历朝换兵劫，谁似二千五百余年大化洽，乃有如主人以润色日出处天子中兴业。”[51]以清代帝王“崇文之大略”来润色“日出处天子”中兴之业，何尝不是一种汉文化权威消解和话语权力的重新配置？

再次，应当注意清代官修总集传入造成的讹误以及假流行现象。张哲俊曾撰文指出五山诗人大量使用类书、诗选等二手文献，而造成一些人红、书红的假象[52]。这种现象在江户时期也较为明显。尤其是江户中后期，他们编纂文献的来源基本都源自清人所编《佩文韵府》《咏物诗选》等书。此外，官修典籍中存在的讹误，由此流入江户诗坛，在整理日本汉籍文献时也应注意此问题。

[本文为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诗学东传与日本江户汉诗演进研究”（项目批准号：24CZW049）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何振]

注

[1] 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图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附录43-46.

[2] 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7.

[3] 本文题目及后文中所说“总集”，实际亦包含类书。类书“是一种分类汇编各种材料以供检查之用的工具书”（刘叶秋.类书简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侧重于资料的分类和摘录。总集指“汇总或选录众人的多种体裁作品编成一书”，内容多是完整的篇章（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485.）。二者在概念、体例上虽多有区别，但都涉及大量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均是日本江户汉籍编纂过程中的重要文献来源。如江户日人所编诗歌选本多抄自总集，诗语文献多抄自类书，诗话编纂则

兼而有之。由于二者在江户的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呈现的特点具有相似性，因此均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但为了行文方便简洁，统以“总集”称之。

[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2017：1726.
[5] 张玉书，等编.佩文韵府[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1.
[6] 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M].蒋廷锡，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3.
[7] 章宏伟.故宫学的视野[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195-199.
[8] 就笔者管见，大庭修探讨了《古今图书集成》在日本江户早期的输入情况（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M].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1967.）；杉仁围绕《全唐诗逸》渡清一事探讨中日文人的交游网络（杉仁.『全唐詩逸』をめぐる長崎の日清文化交流——文化元年の市河三亥を中心に[J].学習院女子大学紀要，2005（7）：43-58.）；王文欣探讨了《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在江户的翻刻及生产阅读群体面貌（王文欣.《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和刻本及其生产阅读群体[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22（5）：86-94.）。其他如甄芸（2012）、方舒雅（2018）、路成文（2020）、王乐（2020）的论著涉及部分日人编选诗歌选本与清代官修总集的关系，但此类相关个案研究较少，作者也未进一步探究二者之间的普遍联系。事实上，江户中期以后，日本诗坛利用清代官修总集编纂诗歌选本、诗语文献的现象极为普遍。
[9] 张伯伟.书籍交流与政治：东亚书籍史研究方法再检讨之一[M]//程章灿，编.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六辑　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23：9.
[10] 林鵞峰，編.華夷變態[M/OL].写本[1674]：1卷序[2025-01-22].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304107/5?ln=ja.
[11] 西岛长孙.敝帚诗话[M]//赵季，叶言材，刘畅，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9：2546.
[12] 荻生徂徠.徂徠集：卷19[M]//王焱，编.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117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162-163.
[13] 田能村竹田.竹田庄诗话[M]//赵季，叶言材，刘畅，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5册，2019：2036.
[14] 刘梅国诗集序[M]//王廷相.王廷相集：第2册.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417.
[15] 刘序枫.试论清朝对日本海难难民的救助与遣返制度之形成[M]//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论考.北京：中华书局，2001：214-216.
[16] 梁田蛻巖.清詩選選[M/OL].刻本.赤石：流芳閣，1755：1b-4a[2025-01-22].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224741/4?ln=ja.
[17]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M].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1967：696.
[18] 顧禄.清嘉録[M/OL].刻本.大阪：大阪書肆，1837：1a[2025-01-22].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453101/3?ln=ja.
[19] 广濑淡窗.淡窗诗话[M]//蔡镇楚，编.域外诗话珍本丛书：第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564.
[20] 如享保七年（1722）“壬寅入津唐本大意书抄”载《佩文斋广群芳谱》，记曰：“此书乃享保六年御用之书也”，又《圣堂文书》“癸卯八月十日持渡御用之书”下记载有《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一部八套、《大清律辑注》一部二套等（参看：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M].戚印平，王勇，王宝平，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108-110.）。此类书籍均是由藩主、将军等官方采购，但采购数量不多，多用来参考、收藏。
[21] 据现存资料统计，《佩文韵府》共传入129部，《佩文斋咏物诗选》共传入217部，《渊鉴类函》共传入63部，《唐宋诗醇》共传入45部。而江户后期诗坛颇为流行的陆游诗集（包括《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剑南诗钞》《剑南诗选》）共传入94部，袁枚《随园诗话》共传入30部，《随园三十种》共传入13部。当然，文集的流行还需考虑到在日本社会的翻刻情况，但舶来书籍的数量至少亦可反映部分社会需求。
[22] 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8.
[23] 英平吉.萬笈堂新鐫發行詩集類略目[M/OL]//館機.晚唐十二家絶句.刻本.江戸：萬笈堂，1808：書末2a[2025-01-22].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192798/85?ln=ja
[24] 館機.佩文斎詠物詩選[M/OL].刻本.江戸：萬笈堂，1830：259b[2025-01-22].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200008478/511?ln=ja.
[25] 岡崎廬門.唐詠物詩選[M].刻本.京都：京都書肆，1776：1a-1b[2025-01-22].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159899/14?ln=ja.
[26] 有关江户时期诗语文献与诗学批评之间的关系问题，可参看：何振.从“发蒙”到“情辞”：作为批评方法的日本江户“诗语”[J].国外文学，2024（3）：54-64.
[27] 大窪天民.增訂宋詩礎[M/OL].刻本.京都：京都書林，1803：序言2a[2025-01-22].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182186/5?ln=ja
[28] 岡崎廬門.題畫詩選[M/OL].刻本.大阪：文栄堂梓，1778：3b[2025-01-22].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200009946/5?ln=ja.
[29] 館機.晩唐詩選[M/OL].刻本.江戸：萬笈堂，1809：“発凡”2a[2025-01-22].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420978/8?ln=ja.
[30] 刘芳亮.“馆卿之喜辑晚唐诗，殆见其机欤”——馆柳湾《晚唐诗选》与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M]//张哲俊，编.东方学术：第3辑[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4：172.
[31] 张玉书.佩文斋咏物诗选[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3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2.
[32] 沖惟穆.律詩韻函[M/OL].刻本.京都：京摂書林，1844：序1a[2025-01-22].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100456177/4?ln=ja.
[33] 芥川丹丘.丹丘诗话[M/OL]//赵季，叶言材，刘畅，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9：861-862.
[34] 原田东岳.诗学新论[M/OL]//赵季，叶言材，刘畅，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9：1034.
[35] 郑永晓指出，从《佩文韵府》收录诗人诗作来看，“学习唐诗在康熙后期属于诗坛主流，宗尚宋诗虽然已成一定的气候，但尚不足以挑战唐诗的绝对优势地位”。（郑永晓.《佩文韵府》的编纂与康熙朝后期的诗坛取向[J].文学遗产，2017（3）：129-141）

[36] 积慈周.葛原詩話後編[M]//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5卷.國分高胤,校閱.東京:文會堂書店,1921:3.
[37] 菊池桐孙认为:“诗用生字者,六如之癖也。……盖渠一生读诗,如阅灯市觅奇物,故其所著诗话,只算一部古董簿。”(菊池桐孙.五山堂诗话:卷二[M]//赵季,叶言材,刘畅,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9:1752.)
[38] 松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兼论明清三大诗论及其影响[M].范建明,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453.
[39] 山本信有.孝經樓詩話:卷之上[M]//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2卷.國分高胤,校閱.東京:文會堂書店,2021:73.
[40] 积慈周.葛原詩話:卷一[M]//日本詩話叢書:第4卷,1921:36-37.
[41] 何诗海,胡中丽.《渊鉴类函》与清初文学观[J].江淮论坛,2021(5):19.
[42] 小野泉藏.社友诗律论[M]//赵季,叶言材,刘畅,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4册,2019:1701.
[43] 高泉性潡.诗话问答[M]//赵季,叶言材,刘畅,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2册,2019:518-519.
[44] 林东溟.:卷之下[M]//赵季,叶言材,刘畅,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2册,2019:785.
[45] 中井竹山.诗律兆:卷六[M]//赵季,叶言材,刘畅,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3册,2019:1217.
[46] 查慎行.查慎行集[M].张玉亮,辜艳红,点校//浙江文从编辑中心,编.浙江文从:第2册.5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4.
[47] 东条琴台.新唐宋联珠诗格:附言[M]//赵季,叶言材,刘畅,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7册,2019:3189.
[48] 戴叔伦.兰溪棹歌[M]//赵季,叶言材,刘畅,等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6册,2019:2414.
[49]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7.
[50] 钱谦益《列朝诗集》、张豫章《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俱载《江干》乃明人张以宁之作,而《全唐诗》误作戴叔伦,可见其致误原因当是抄自《全唐诗》。
[51] 森槐南.槐南集[M]//王焱,编.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386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184-186.
[52] 张哲俊.五山文学二手文献引起的流行假象与汉文水平问题——比较文学文献学示例[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3(4):1-12.

参考文献

王乐.日本江户、明治诗坛的清诗受容——以和刻本清诗总集为中心[D].上海:上海大学,2020.
方舒雅.馆机《晚唐十家绝句》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8.
路成文.和刻本《咏物捷径》考论[J].北方论丛,2020(4).
甄芸.《佩文斋咏物诗选》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2.

作者简介:何振　男　汉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汉文学、明清文学
联系方式:E-mail:hezh27@126.com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Qing Dynasty Official Collections in Edo Japan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Qing-dynasty officially compiled anthologies during the Edo period in Japan reveal the subtler dimensions of Sino-Japanese textual exchange. These anthologies, comprehensive in scope and inclusive in content, broke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Yuyuan School's focus on Tang and Ming dynasty poetry selections. They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literature in mid-to-late Edo-period Japan, promoting shifts in poetic styles and literary ideologies. However, due to factors such as authorial self-promotion, editorial conventions, and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compilers seldom acknowledged their textual sources, leading to leading to the obscuring of textual origins. Simultaneously, the recompil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texts in Edo society was accompanied by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riginal discursive authority and the 'localize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exts. Therefore, by tracing sources and conducting collations to reconstruct the specific landscape of Sino-Japanese textual exchange during the Edo period, we can more comprehensively demonstrate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Japan.
Keywords: official collec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Edo; compilation of books; cover

Author's Information:
He Zhen (Male)
Lecturer a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mail: hezh27@126.com

(责任编辑:王晨萌)